

家庭社会资本在帮助中国贫富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作用

——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朱祥恺

香港浸会大学 000000 (HKG)

摘要: 教育一直被视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但现如今, 家庭社会资本在帮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于林楠的社会资本理论, 并引用多方学者研究观点, 从家庭社会资本中的信息、影响、社会信用与物质援助这四个维度对贫富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富人家庭利用社会资本所获取的信息的广泛性、施加的影响的强力、取得的实际帮助以及给予孩子的教育期待支持富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做出更充分的准备。同时, 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用在帮助升学方面意义不大。并针对高考制度, 提出相关解决措施。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贫富不均以及阶级流动固化问题逐渐开始显现。众所周知, 教育一直被视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但现如今, 在我国教育体制中, 进入知名大学并获得学业成就的过程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不再只是依靠学生自身的先天天赋与后天形成的学习能力, 家庭社会资本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由家庭因素而造成的教育不公的现象逐渐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初期秉承“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 这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高速发展, 但同时也造成了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户籍所在地、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等多方面的分配不均。近些年, 随着高等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实施,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机会竞争逐渐从数量竞争转移至质量竞争。高等教育机会竞争的普遍存在, 导致其始终不可避免的受到家庭影响, 因此将家庭资本作为影响因素研究高等教育教育机获得情况, 是促进高等教育公平适切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林楠(2001)在《社会资本》中提出在社会网络中, 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性的资源, 使行动者能够从理性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思考, 进而更好地采取进一步行动, 更有效地选择能够使用的和获取的资源。基于此, 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这种资源不是单一的资源, 不为个人所拥有, 而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 二是社会资本存在多种形式, 比如信息(Information)、影响(Influence)、社会信用

(social credentials)、物资援助(Material aid)和自我加强(Reinforcement)。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余期江、潘彭丹(2004)的研究表明, 家庭资本处于中上阶层的学生机会更多, 在专业选择上, 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而言会在专业选择上该有选择热门专业的机会。刘精明(2005)研究了父亲的职业背景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相关性, 发现父亲的职业如果是处于中高级的白领的位置, 则他们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概率远远要高于父亲职业地位相对低的子女。谢作栩、王伟宜(2006)同样发现处于中上层社会的子女在入学机会上的概率要大于下层社会的子女。樊雪志和钟奉(2007)借助实证研究了解到, 在义务教育时期, 非干部和干部家庭的区别已经开始显著。在择校机会方面, 相比较于非干部家庭子女而言, 干部家庭子女达到其1.45倍。邵丽丽、胡业刚(2011)亦肯定了家庭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产生影响。

个体的社会资本的论述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调研, 这种社会环境可以是家庭、社区、学校等(科尔曼, 1988)。本文则着重学生从家庭中获得的资本, 即家庭社会资本出发, 采用贫、富家庭两个视角, 展开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进入中国知名大学影响的研究, 研究基于林楠的社会资本理论, 并引用多方学者研究观点, 从家庭社会资本中的信息、影响、社会信用与物质援助这四个维度对贫富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影响进行分析。首先, 我们会分析家庭社会资本中的四个形式: 信息、影响、社会信用、物质援助如何帮助子女接受到高等教育。

中国知名大学 foodnotes

中国知名大学的划分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等教育不断发展,逐渐由数量竞争转化为质量竞争。换言之,上大学不再成为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上知名大学成为了很多家庭的追求。2015年中国政府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进程实施了《高等教育政策》,并于2017年9月公布高校建设名单,这其中的42所一流大学也成为大众广为认可的中国本土知名大学。

一、家庭社会资本中的信息 (Information) 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

家庭社会资本中的信息 (Information) 主要从两方面影响子女进入中国知名大学。一方面父母可以为子女提供除了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之外更多样化的途径进入中国知名大学,另一方面,父母也可以提供上大学的信息帮助子女更好的选择适合他们的专业。子女获取信息依靠其父母的社会网络,而他们的父母通过他们的弱关系和强关系来获取有效的信息。“弱关系”和“强关系”的概念最早是由格兰诺维特 (Granovetter) 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和后续的《找工作》一书中提出的,认为关系的强弱由互动的频繁程度、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共同构成。弱关系连接不同的个体,可以为个体带来更多异质性的信息 (information)。强关系,在另一方面,则连接状态相同的个体,为个体带来“影响” (influence) 也可以带来信息。

家庭成员提供了信息方面的社会资本,他们为子女提供进入高等大学除了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之外更多样化的途径。相较于贫困家庭,富人家庭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也具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在获取不同渠道进去中国知名大学的信息时,富人家庭依靠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众多的弱关系,可以为他们的子女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 (舒心, 2017)。例如,富人家庭会更容易获得其他进去中国知名大学的渠道,自主招生夏令营就是这些富人家庭的“战场”之一。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想进入这个夏令营来为自己的孩子竞争到更有利进入知名大学的条件,比如高考降分录取,甚至是直接录取。但想进入这个夏令营,必须依靠广泛的信息才有机会进入,富人家庭依靠自己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选择的优先权。

父母和亲属作为有价值资源的传递者,他们提供的各方面有关上大学的信息可以帮助子女更好的选择适合他们的大学和专业 (孔钺钺, 2019)。例如,某父母的亲属有从事律师职业,他们希望子女之后能够选择法律相关专业,所以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帮助她查找法律类的相关信息。某父亲花费一年的时间写满三个笔记本以此研

究高考志愿如何填写,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各专业录取情况、每年录取的分数线、录取的最低/高位次、全国专业排名、就业前景、就业方向等。专业、学校、城市环境、地下水污染等皆考虑在内 (吴鹏, 2019)。

此外,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由于其家庭与社会联系程度紧密,更易于把握社会主流价值的发展与走向,选择更有利于子女未来发展的学校或专业。穷人家庭通常属于社会资本劣势的阶级,由于社会关系的简单和人脉的缺乏,关于高等教育的信息来源单一,获取的有效信息相对匮乏,受自身环境和价值考量影响对子女高等教育的判断往往比较片面和短视,容易造成对不同学校、专业的误判,影响子女未来的发展。而富人家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其父母可以通过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获取更全面的的信息,更宏观看待子女的高等教育选择,帮助子女竞争更具有发展优势的学校资源或专业资源 (吴鹏, 2019)。

二、家庭社会资本中的影响 (Influence) 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

如前文所提,强关系带来影响;富人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着“台面下”的影响,通过两种作用机制。首先,富人家庭的学生直接从父母与他人的强联系中获得资源:通过父母的强关系所带来的影响,“走后门”式的私下操作令富人家庭的学生受益于获得更优质稀缺的教育资源,如校外名师独家辅导,或是得到较为难得的直入名校机会,如名校自主招生名额 (张和平, 张青根, 尹霞)。换言之,子女通过父母的直接强关系在大学录取的准备过程中受益。具体而言,一方面,父母通过自身的影响帮助学生参与数量有限且有一定准入门槛的校外培训班和私人辅导。这些课外培训提升了学生的应试技巧、加强了学生的自身竞争力,帮助学生在大学录取过程中更好地准备自己。当校外培训的作用逐渐被重视,被视为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家庭社会关系以及家庭资本的影响对校外培训资源获得的决定性影响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 (张和平, 张青根, 尹霞)。另一方面,父母的强关系为学生提供了高考之外进入名牌大学的其他途径。现行高考制度下同时还存在自主招生政策、加分政策等多样化的招生选拔政策,而这些政策实质上更偏向于家庭社会资本丰富的个体,因为想要获得超越大部分同龄人的学业表现、能力表现、科技竞赛表现、体育表现等都需要家庭的进一步支持,这种支持除了受到学生本人能力的影响,还受到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在自主招生、加分政策仍再进一步优化的过程中,不乏部分家庭通过自身社会资本优势进行私下操作的行为,造成了同等竞争中的不公平,是对具有等

同能力而社会资本相对薄弱家庭子女权利的侵犯与剥夺(吴鹏)。

除此之外,强关系亦可以作为桥梁,使本非强关系的个体、组织为彼此带来强关系的影响。通过一位中间媒介B(B为个体A和C共同的强关系),A和C间接形成了强关系,为彼此带来影响来达到目的,这是基于A、C与B之间的信任、以及互惠原则下的义务(林楠,2001)。这种强关系作为桥梁的机制在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如都有体现;在中国富有人家的孩子在进入知名大学过程的论述中,强关系作为桥梁这一机制的应用亦屡见不鲜。2020年明星全卓在一次直播中自曝“曾在高考时将自己的往届生身份改为应届生”,引发社会关注。事后经多方调查,证实全卓确实存在高考舞弊行为。2012年,全卓参加高考时未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解放军艺术学院,而该校又有只招收应届生的要求,为了第二年能继续报考该校,全卓的继父利用自己的影响寻找相关机构替全卓伪造了应届生身份。2013年,全卓以伪造的身份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最终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全卓的继父利用自己的强关系作为桥梁,寻求另一层强关系来施加影响,最终通过多重强关系将其送入理想名校,这正是家庭资本中的强关系作为桥梁在富人家庭孩子升学中“走后门”的情况下所施加的“台面下”的影响。

三、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ential)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

当某种社会资源与个人的关系为人所认可时,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如某些组织、机构,会认为这种资源与个体之间被认可的联系意味着个体可以提供除了他本身所具有的社会资源之外的一些附加资源,而这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受益(林楠,2001)。个体从家庭享用的社会信用受益,从而进入知名大学,这在西方国家有一定的适用性(Boliver, 2013; Sandefur, 2006)。然而在中国,高考制度的普适性、公平性和近些年教育改革成果让家庭的社会信用对大部分普通学生进入知名大学不起作用。因为分数是学生获得何种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的直接影响因素,而父母的社会信用并不能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这一结论与肯尼斯等人(2003)的结果一致,即父母的社会信用的帮助虽然会影响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但这种社会资本并不足以使学生获得上大学的机会,需要其他社会资本。

四、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物质援助(Material aid)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

本文选择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娱乐

支出和教育培训支出为代表,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物质援助(Material aid)对于子女进入中国知名大学具有显著影响。在家庭的人均总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子女就更有可能会接受高等教育。在文化娱乐、教育培训支出方面,家庭投入越多,子女也就更有可能会接受高等教育。

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会影响子女追求更高层次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也与许多量化研究的结论一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所在地越是大中城市,其子女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反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家庭所在地在农村,其子女越有可能接受到层次较低的专科教育(刘志民,高耀,2011)。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资源的相互排斥,主要表现为家庭资本优渥的子女从一出生就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通过缴纳赞助费或择校费让子女进入具有较高声誉的学校学习,或者在义务教育阶段通过支付相关的补习费用为子女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而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而言,随着教育成本的逐渐增加,父母很难担负起昂贵的学费,最终还会出现“考得取,上不起”的现象(舒心,2017)。

不仅如此,当前高经济收入群体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受教育机会获得,进一步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更催生了择校、学区房等社会问题。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普通的受教育机会获得就足以让他们生活拮据,面对高昂的择校费、天价的学区房,他们只能无奈选择放弃。

五、除了运用林楠(2001)所识别的四种社会资本分析穷富人家孩子利用家庭的社会资本进入知名大学的差异外,科尔曼(1988)也提出了家庭的社会资本在教育中其他重要的形式:父母对孩子的义务与期望以及规范与有效惩罚。他表示,社会资本在特定的社会框架内促进这一框架内的主体某些特定的、于个体有价值的行为。在本文的论述中,这一特定的社会框架是家庭范围,主体是出身贫或富家庭的、面临升学的学生们。家庭单位下的父母陪伴孩子,鼓励他们、赋予他们教育期望,同时施加规范与有效惩罚,规定学生们作为主体不能触犯的规则,比如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或精力学习(科尔曼,1988)。富人家庭,相较于穷人家庭,更具有对孩子有更多教育期望的社会资本:因为他们有更多样化的信息、可以施加更有力的影响、也能够带给孩子更多的实际帮助。而穷人家庭中的孩子如果持有过高的教育期望,由于家庭社会资本的不足,可能无法支持孩子实现教育理想。在为进入优秀大学作准备的过程中,富人家庭有相对充足的社会资本对孩子抱有较高的期待值,

以此鞭策孩子实现教育理想,同时制定有效的惩罚机制规范孩子的行为;穷人家庭,反之,可能不具备同样的社会资本去鼓励孩子实现进入高等学府的梦想。

以上为家庭社会资本中的四个形式帮助富人家庭的孩子进入知名大学的具体分析。下面,我们将介绍减少家庭社会资本对进入高等学府影响的具体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通过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旨在减少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物质援助。

高考是无数人命运的转折点,也同样许多家庭向上流动的希望。作为我国的基本教育制度,高考的公平性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平。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高等教育的分层、人才培养的模式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现行高考招生制度由于区域化差异导致的竞争难度差异、自主招生模式非标准统一化导致的考试舞弊等现象屡屡受到诟病,家庭资本具有显著优势的子女甚至采取高考移民、买证书加分等影响招考制度公平正义的行为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严重侵犯了贫穷家庭资本子女的高等教育获得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选拔水平,适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

优化招生考试制度,促进招考秩序公平,是消弭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负面印象影响的重要工作之一。最重要首先是均衡招生计划名额分配,给予贫困地区政策上的支持。前文在分析富人家庭社会资本支持孩子进入知名大学的作用中,我们检验了信息、影响、社会信用、物质援助以及科尔曼所提出的教育期待和陪伴五个方面。而削弱家庭单位下社会资本对于学生进入知名大学的作用,将立足于弱化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物质援助,重点提出三个解决措施。

1.规划相当数量的重点招生指标给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贫寒有时候不是后天因素导致的,是社会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历史原因等综合因素造成的,由于社会资本的影响,只靠个人想要突破并非易事。此外,富人家庭所提供给予子女的社会资本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升入优秀高校的可能性,同时挤占着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穷人中拥有才华和能力的个体无法得到相应的教育资源,最终导致资源的浪费。因此,作为高校,应为足够优秀但没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农村学子预留一定招生比例。努力促进教育公平,适当全免学费。树立学习典型,给予更多寒门出身的人以希望。高校相关人员可深入农村探访,或由基层推荐,挖掘真正的有潜力的人,毕业前加强就业指导,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社会也应更加开放包容,回归“能力本位”评价机制,创造相对均

等、公平的就业机会,真正做到让知识改变命运。

2.减少高校属地优势。家庭社会资本对进入中国知名大学的影响很多都来源于高考移民,不可否认,高校通常都会有属地优势,即高校所在省份或者失去的考生可以以相较于其他省份或者市区考生较低的分进入,很多家长利用这个优势,在录取分数较低的城市买房建立户口,以此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更优等的学校。减少高校属地优势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增加了高考的公平性。

3.减少课外补习班总体数量。近年来,国家取缔课外补习班的力度越来越大,“双减”政策(即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减轻校外培训负担)的正式推行,令一些传统的课外补习机构如“新东方英语”、“学而思”受到了冲击。事实上,这一政策的推行在客观上也弱化了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物质援助。如前所证,在中国传统课外补习班流行的情况下,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的教育支出越多,子女也就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而取消多种课外补习班以达到为学生减负以及促进公平的“双减”政策,降低了富裕家庭提供传统的物质援助作为学生社会资本的可行性。然而无可否认,国家整顿课外补习班的决心并不没有磨灭升学考试中的激烈竞争,由此,家长的培训需求是现实存在的。一旦合法的渠道无法满足,培训或许会转向地下,如私人家教、或是机构辞退的教师进行小课辅导。这些非合法的组织团体管理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富裕家庭亦可以通过社会资本中广泛的信息来源、强关系的影响最终获得这些更难得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的子女得到物质援助。其结果可能不但没有促进教育公平,反而加大了贫富家庭出生的孩子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因为他们家庭所具备的社会资本具有无法逾越的数量和质量的上的差异。

六、总结

在社会学的讨论中,每一阶段的升学都是一次受教育资源、机会的重新分配,而除了“学习能力”之外,家庭、地区、城乡、性别等各方面因素一起扰动着分配的权重,共同造就社会学家分析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本文立足社会网络学说,分析家庭社会资本在帮助中国穷人和富人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作用,认为富人家庭利用社会资本所获取的信息的广泛性、施加的影响的强力、取得的实际帮助以及给予孩子的教育期待支持富人子弟接受到高等教育做出更充分的准备。同时,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用在帮助升学方面意义不大,因为不同于西方国家申请大学过程中的推荐流程,额外推荐不适用于中国大部份高考生。为减少家庭社会资本

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 本文通过立足高考制度改革提供了三个解决措施, 旨在减少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物质援助, 进而减少家庭社会资本带来的不公平。从本质上来说, 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阶层拥有社会资本的不均(李春玲): 家庭社会资本在中国这一人情社会有着广泛的应用, 不单局限在升学, 还有求职等方面(林楠, 2001; 边燕杰, 1997)。因此, 解决“从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的升学乃至阶级固化问题, 从社会网络的分析入手, 探索社会资源不平等的成因、展现形式和呈现不失为一种可参考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 [1]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66-385.
- [2] Boliver, V. 2013. How fair is access to more prestigious UK universit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4(2), 344-364.
- [3]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80.
- [4] Nan Lin. 2001. "Building a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Pp. 3-29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 [5] Sandefur, G. D., Meier, A. M., & Campbell, M. E. 2006. Family resource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attenda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2), 525-553.
- [6] 杨玲、张天骄. (2020). 家庭背景、重点中学和教育获得. *教育与经济* (05), 33-44.
- [7] 汪鲸、罗楚亮. (2019). 父母教育、家庭收入与子女高中阶段教育选择. *劳动经济研究* (04), 32-52.
- [8] 蔡庆丰, 程章继, 陈武元. (2021). 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与阶层流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与思考. *教育发展研究* (20), 9-21
- [9] 吴鹏. (2019). 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邮电大学).
- [10] 杜文豪. (2021). 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财经大学).
- [11] 舒心. (2017). 家庭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湘潭大学).
- [12] 孔钺钺. (2019). 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外国语大学).
- [13]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中国政府网. 2015-11-05[2016-06-29].
- [14] 刘志民, 高耀. (2011). 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12), 18-27.
- [15] 习近平.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 上 的 讲 话[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201/c40531-29800479.html>, 2014-08-18.
- [16] 张和平, 张青根, 尹霞. (2021). 家庭资本、校外培训与教育机会公平. *教育学术月刊* (02), 3-11.
- [17] 夏千惠&华之安. (2020). 艺人全卓高考舞弊事件. *中学生天地* (C版) (09), 5.
- [1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